

普通语言学论文选集

(上)

(波兰) 博杜恩·德·库尔德内 著
杨衍春 译

中华女子学院



0410870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H0-53
26
-1

普通语言学论文选集

(上)

(波兰) 博杜恩·德·库尔德内 著

杨衍春 译



中华女子学院



0410870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普通语言学论文选集/(波兰)库尔德内 著;杨衍春
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3
ISBN 978-7-5495-1102-0

I. ①普… II. ①库… ②杨… III. ①语言学—文集
IV. ①H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62493 号

出品人:刘广汉
组 稿:刘广汉
责任编辑:刘冬雪 刘 丹
装帧设计:赵 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31260822-126/127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

(山东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690mm×960mm 1/16

印张:40.25 字数:560 千字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9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0539-2925659)

前言：博杜恩·德·库尔德内的生平与学术

博杜恩·德·库尔德内是波兰人,但在他长达 64 年(1865—1929)的学术研究和教学生涯中,有一半以上的时间是在俄罗斯境内度过的,为俄罗斯语言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所以,在俄罗斯的许多著述中称他为波兰—俄罗斯语言学家。他在彼得堡的弟子谢尔巴说:“他是俄国学者,因为他属于俄国,同时他也属于波兰语言学界,他用俄语写的著作很多,俄国弟子也多,波兰弟子虽少,但无疑他也是波兰学者。”(刘耀武:1998,49)博杜恩·德·库尔德内的波兰籍学生多罗舍夫斯基写道:“博杜恩·德·库尔德内一生的劳动属于两个民族:波兰和俄罗斯。我想,在语言学领域,无论是他的波兰学生,还是俄罗斯学生都对博杜恩·德·库尔德内心存感激。感谢他在自己学生记忆中留下的人的形象。即追求真理和崇高的情感及其对每一个不公正现象表现出的苦痛。”(I,30)

博杜恩·德·库尔德内 1845 年 3 月 3 日出生在华沙附近的拉杰明镇。先祖是 18 世纪初移居波兰的法国贵族,父亲是一个土地测量员。当时的波兰国土早已经被沙俄、普鲁士和奥地利瓜分,这一历史悲剧直接影响了这个未来语言学者的命运,并在他的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博杜恩·德·库尔德内在家里接受了启蒙教育。1857 年考入华沙实科中学,1861 年转学到华沙重点学校的预科班,为进入物理数学系学习做准备。在普莱班斯基教授开设的课程《理论学科的方法论和百科知识》的影响下,他决定献身于语言学研究,尤其是斯拉夫语言的研究。1862 年博杜恩·德·库尔德内考入了华沙大学(当时的重点学校)历史语文系斯拉夫语言专业,1866 年大学毕业。

在四年大学学习的时光里,克维特、普舍博罗夫斯基、霍洛舍夫斯基教授开设的课程对博杜恩·德·库尔德内科研兴趣的萌发产生了特殊的影响。在此期间,他系统地学习生理语音学以及梵语、立陶宛语和斯拉夫语系诸语言。与此同时,他还搜集有关波兰语言史资料,尤其是有关变格的内容,系统地研究了著名学者施坦达尔和其他一些哲学语言学者的论著。当时他已经发表了一些用波兰语写成的关于语音生理特征的评论和译文。

1866年获得学位以后不久,在俄罗斯国民教育部的直接资助下,博杜恩·德·库尔德内获得了一次出国进修的机会。他在布拉格、耶纳用了三个学期的时间聆听德国著名历史语言学家施莱赫尔的课程,在柏林用了一个学期的时间学习梵语,并与后来的勃鲁格曼、德尔布吕克等新语法学派的中坚人物结识。1868年,博杜恩·德·库尔德内被派往彼得堡大学,在И. И. 斯列兹涅夫斯基教授的指导下进一步深造。1870年博杜恩·德·库尔德内在莱比锡发表了论文《论14世纪以前的古波兰语》。同年,他在这篇论文的基础上获得彼得堡大学的硕士学位。^① 博杜恩·德·库尔德内在这篇论文中分析了在古波兰语手稿文献中拉丁语词语及表现形式,第一次探索了早期波兰语中的历史语音问题。

同年末,在导师И. И. 斯列兹涅夫斯基教授的直接推荐下,博杜恩·德·库尔德内作为编外副教授在彼得堡大学开始讲授比较语法,成为该所大学第一个教授比较语法的教师。1872年,博杜恩·德·库尔德内在俄国科学院的资助下,来到奥地利西南部和意大利北部,对斯洛文尼亚方言和列奇亚方言进行实地调查研究,记录了大量当地人的口语材料。除此之外,博杜恩·德·库尔德内还到过米兰和莱比锡,结识了阿斯科利等著名语言学者。在莱比锡与保罗一道聆听过新语法学派代表人物之一雷斯琴讲授的课程。三年后,博杜恩·德·库尔德内写成论文《列奇亚方言语音初探》。1875年博杜恩·德·库尔德内以此篇论文获得彼得堡大学比较语言学博士学位。后来这篇论文又获得了彼得堡科学院乌瓦罗夫奖金,成为描写方言语音特点的范文。

1874年,凭借在俄罗斯和西方语言学界的知名度,博杜恩·德·库尔德内被喀山大学比较语言学教研室聘为副教授。但博杜恩·德·库尔德内接受聘任后,并没有立刻奔赴喀山大学工作。俄罗斯学者Л. А. 安德烈耶娃在查阅了

① 虽然博杜恩·德·库尔德内已经在波兰获得硕士学位,但由于波兰学位当时不被俄罗斯所承认,于是他又在彼得堡获得第二个硕士学位。

档案资料后,详细描述了其中缘由。她这样写道:“博杜恩·德·库尔德内1874年8月3日被聘到喀山任职,但实际到任时间是1875年秋天。在这期间博杜恩·德·库尔德内先后往喀山写了三封信。其中两封是写给历史语文系主任И. М. 多布罗特沃尔斯基教授的,另一封信是写给H. H. 布里奇教授的。第一封信写自莱比锡,而第二封和第三封信写自拉多姆。在第一封信中博杜恩·德·库尔德内请求批准他在1874—1875年学年暂不去喀山任职。原因在于他在1875年3月1日前在国外出差,在这之后他还需要回到彼得堡参加博士论文答辩。而在学年末返回喀山,然后再辗转回彼得堡没有意义。于是,他写信请求延迟到喀山任职的时间。因此,博杜恩·德·库尔德内正式到喀山任职的时间应是1875年9月12日。”(Андреева: 1982, 42)

1875年秋天,博杜恩·德·库尔德内正式离开彼得堡大学,来到喀山大学历史语文系比较语言学教研室任教,从此揭开了在喀山大学的教书生涯的序幕。在这里博杜恩·德·库尔德内以副教授的身份,很快成为喀山大学比较语言学教研室主任。紧接着在1875年12月,在系主任H. H. 布里奇的推荐下,学术委员会一致同意聘任博杜恩·德·库尔德内为编外教授。1876年9月29日,H. H. 布里奇再次举荐博杜恩·德·库尔德内为正式教授。他这样写道:“我认为自己有责任让历史语文系关注比较语言学教研室编外教授博杜恩·德·库尔德内勤奋的教学活动和他在教学中取得的成绩,关注一下他在学术上取得的成绩。”(Андреева: 1985, 96)1876年12月4日,博杜恩·德·库尔德内成为比较语言学教研室正式教授。

博杜恩·德·库尔德内在喀山大学的生活紧张而忙碌。其间他开设了语言学概论、斯拉夫语比较语法、印欧语比较语法、俄语比较语法、梵语、拉丁语比较语法、德语、立陶宛语和意大利语等各种类型的课程,他以渊博的知识、独特的讲课形式受到了师生们的欢迎。从1876年起,他每周都用6—8小时的时间开设两次家庭课堂,吸引了一批年轻有为的教师和学生,形成了后来的语言学小组,为喀山大学营造健康的学术氛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博杜恩·德·库尔德内在喀山时期的学术和教学活动是俄罗斯语言史上的重要时期。“保存下来的档案资料表明,博杜恩·德·库尔德内在喀山的活动是多方面,劳动量非常大的,又是执著的。所以,毫不奇怪,最终他取得如此辉煌的业绩——创建了喀山语言学派。”(Андреева: 1985, 96)

博杜恩·德·库尔德内正式身份是喀山大学的教授,但他在1876年至

1880 年期间还任教于喀山神学院,讲授俄语和斯拉夫方言。在 1881—1882 年间,博杜恩·德·库尔德内曾到威尼斯、巴黎和莱比锡作学术研究。

虽然,博杜恩·德·库尔德内在喀山时期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学术业绩,但他在喀山时期的生活却不是一帆风顺的。1883 年 2 月—3 月,为了保护因政治原因而被学校开除的学生,博杜恩·德·库尔德内与大学委员会发生直接冲突,遭到反对派的围攻,博杜恩·德·库尔德内因此处在了一个被社会完全孤立的状态。而博杜恩·德·库尔德内妻子的突然去世又给他一个沉重打击。他给科学院院士 B. И. 拉曼斯基的信中表达了自己痛苦悲伤的情绪,他这样写道:“没有了亲人,没有了年轻朋友。”(Леонтьев: 1965, 88)

1883 年,博杜恩·德·库尔德内最终离开了工作八年的喀山大学,来到了杰尔普特大学^①,担任斯拉夫语言比较语法教研室主任。在繁忙的授课之余,他潜心研究,写成了一系列重要的语言学理论著作。在从事科研工作的同时,他还利用一切可能性,填补自己在语言功力方面的空白,系统地学习了亚美尼亚语、爱沙尼亚语、拉脱维亚语、拉丁语、阿拉伯语以及病理语言学与高等数学。1887 年,博杜恩·德·库尔德内荣幸地当选为克拉科夫科学院院士。^②

六年后,当杰尔普特大学被俄罗斯化以后,博杜恩·德·库尔德内被迫辞去这所大学的教师职务。1893 年他来到当时位于奥匈帝国的克拉科夫大学任教。在克拉科夫大学他作为荣誉教授讲授比较语言学和梵语课程。博杜恩·德·库尔德内在克拉科夫大学的工作时间很短暂。1899 年维也纳国民教育部以博杜恩·德·库尔德内有民族情绪为由,不打算继续延长与博杜恩·德·库尔德内 5 年期的合约。博杜恩·德·库尔德内再一次面临着抉择,陷入令人痛苦的生活危机中。他在给 A. A. 沙赫玛托夫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在此地的教学活动将于 1899 年结束。维也纳政府完全不征求系里的意见,只是通知我不与我延续合同了。”(Колецов: 2003, 286)于是他不得不重新踏上俄罗斯的土地,另谋生路。

离开克拉科夫大学以后,博杜恩·德·库尔德内于 1900 年重返彼得堡大学。虽然早在 1897 年时博杜恩·德·库尔德内已经当选为彼得堡科学院通讯院士,但由于受到民族歧视,他在彼得堡大学并没有受到公正的待遇。在这里

① 杰尔普特大学,现称塔尔图大学,位于爱沙尼亚境内。

② 克拉科夫科学院位于波兰境内,始建于 1872 年,包括语文学、历史哲学、物理数学三个专业。

他不得不以编外副教授身份任教。1901年以后,在历史语文系的提议下,在A. A. 沙赫玛托夫和C. K. 布里奇的帮助下,才成为比较语言学和梵语教研室的正式教授,一直到1918年。在这期间他培养了Л. B. 谢尔巴、E. O. 波利万诺夫、Л. П. 雅库宾斯基、С. И. 伯恩斯坦、Б. А. 拉林等一批在学术上有造诣的语言学者,形成了彼得堡语言学派。在彼得堡时期他继续钻研语音学、词汇学、词典学、语言现象的心理特性及普通语法学问题。除此之外,他还在高等女子学校讲授斯拉夫语和印欧语比较语法,被学生称为“杰出的学者,真理的捍卫者和优秀的人”。(Березин: 1976, 174)

第二次重返彼得堡以后,博杜恩·德·库尔德内在这里度过了十八个春秋,生活非常窘迫。他在给A. A. 沙赫玛托夫的信中写道:“我的大学同事中,没有一个人的经济状况像我这样糟糕……我连起码的花销(饮食、子女学费等)都不够。现在我得出一个结论:娶妻生子是我的一大罪过。”(Колесов: 2003, 287)他给Л. B. 谢尔巴的信中也描述了自己的坎坷生活:“由于命运的捉弄,我这个‘有知识的无产者’为了糊口,仍不得不写些可怜的政治论文。”(信德麟: 1998, 2)

在彼得堡大学博杜恩·德·库尔德内除了教授课程以外,还承担了第三版达理词典^①的补充和编辑工作。他给予达理词典高度的评价,他在修订补充后第三版的前言中这样写道:“达理词典是无可争议的财富。这部词典从某一点上说是独一无二的。很难找到一部词典能够容纳如此多的材料,而且这些材料是一个人从一个民族活的口语中获得的。达理词典不仅是人类语言最富有的内容之一,还是研究和确定民族智慧的材料,判断俄罗斯民族世界观的集锦。”(Вомперский: 1976, 12)在第三版中,博杜恩·德·库尔德内完全保留了第二版的模式。他只是对词条进行了一些补充、说明,取消了第二版中的一些明显的错误。博杜恩·德·库尔德内将这些错处用[]表示,以区别达理写的词条和自己写的词条。为了方便实用,博杜恩·德·库尔德内在第三版中将所有单词按照字母顺序排列,增加了许多新词语,包括他在喀山生活时期记录的一些词语,其中大部分是博杜恩·德·库尔德内采风地区的方言。在修订词典时,

① 弗拉季米尔·达理是俄罗斯词典学家、作家、医生。他一生用了将近四十年的时间编写现代大俄罗斯词典。词典内容非常丰富,包含了四万五千多个词条,真实地反映了大俄罗斯语言中词语的意义。至今为止,这部词典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博杜恩·德·库尔德内充分考虑到俄语的发展因素,认为修订后的词典应当真实反映发生在言语活动中的所有社会变化。他在这一版中加入了词语解释,而且这些词语反映了进步知识分子是如何用词的,词典中也包含了博杜恩·德·库尔德内的一些政治观点。

第三版达理词典问世后,博杜恩·德·库尔德内遭到了反对派政论家和一些支持黑色百人团(1905—1907)^①政策的语言学者的疯狂批判,他们指责博杜恩·德·库尔德内摧毁了达理。A. A. 列昂基耶夫指出:“正是由于词典编辑的政治观点,而不是因为新版词典缺少科学性而引起的这场批判,才有了关于博杜恩·德·库尔德内好像毁了达理的无稽之谈。(Леонтьев: 1960, 12)

尽管有批评的声音,但也不乏赞扬之声。博杜恩·德·库尔德内修订的达理词典第三版,受到了苏联文化界、语言学界的好评,他们认为第三版达理词典比前两版更加完善。A. M. 高尔基、Л. B. 谢尔巴、B. B. 维纳格拉托夫都发表过评价。就连 B. И. 列宁在给 A. B. 卢那察尔斯基的信中都高度评价了博杜恩·德·库尔德内版本的达理词典。他写道:“不久前我有幸第一次看到了著名的达理词典,很遗憾,也很惭愧。”(Вомперский: 1976, 20)

作为进步思想家,除了撰写学术著作外,他还写了一些政论性的文章,反对当时奥匈帝国、沙皇俄国和地主统治下对波兰等国家的民族压迫政策,维护这些国家的少数民族权益,捍卫他们的民族自决权。1914年,博杜恩·德·库尔德内因发表写于1905年的小册子《论自决权中的民族特征与地域特征》,被控犯有反对国家罪,身陷囹圄。因为以 A. A. 沙赫玛托夫为首的俄国知识分子的强烈抗议,3个月后他被释放出狱,于1917年二月革命以后才得以重返彼得堡大学的讲坛。

1918年7月8日,博杜恩·德·库尔德内向大学校长请假安排家事,举家回到了故乡华沙。回到华沙以后,他给校长办公室的信中写道:“因为顾及现有状况和生活条件,不可能再考虑返回彼得堡的事情。我恳请允许我在华沙大学讲课。在这里暂时没有固定教授职位,所有教课的人都是自由聘任的。”(Колесов: 2003, 313)

后来,已年逾古稀的博杜恩·德·库尔德内被遴选为华沙大学的荣誉教授,一直到1929年病逝。1922—1923年期间,他还受邀到布拉格大学和哥本哈根大

① 黑色百人团即俄罗斯人民同盟,于1905年出现在俄罗斯政治舞台上,属于极右翼组织。

学讲学。1925年,在他八十高龄时,受邀回苏联参加俄罗斯科学院成立200周年庆典,但由于签证和经费问题最终未能成行。他在给B. A. 博戈罗季茨基的信中写道:“我本人非常想去……但是这一次的出行不取决于我,当权者是反对的,所以我不能获取出国护照,更不用说出行的经费了。”(Леонтьев: 1965, 88)

在华沙大学他虽然年逾古稀,但仍然执著于自己的政治信仰和追求。他在华沙的学生B. 多罗舍夫斯基回忆道:“他在第一堂课上就发表了有关波兰作为一个国家的复兴,而不是为了增加帝国主义国家数量的言论。这些言论既招来了掌声,也招来了嘘声。”(Кондрашов: 1995, 96)

纵观博杜恩·德·库尔德内的一生,可以将其研究历程分为喀山时期、杰尔普特时期和彼得堡时期及华沙时期。在喀山时期博杜恩·德·库尔德内的创造力既大胆又独特。而杰尔普特时期使“博杜恩·德·库尔德内的学术研究达到了顶峰。一段时间,他的科学天分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Березин: 1976, 175)在彼得堡时期他进一步完善了音位学理论,而在华沙期间在没有放弃语言科学研究的同时,他更加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撰写文章保护居住在波兰、以色列、乌克兰及白俄等地的少数民族。在他的倡议下,成立了“波兰语友协会”。

尽管生活条件千变万化,但博杜恩·德·库尔德内对于科学的不懈追求成为他生活中各个时期的动力。他以丰硕的语言学学术成果获得了世人的高度评价。A. A. 沙赫玛托夫说:“他是俄罗斯语言学界先锋者之一。他改变了语言科学发展的方向,他的名字作为俄国语言学派创始人出现在国外教科书中。”(Колесов: 2003, 298)他的同事和学生也对他的学术成就倍加赞赏。A. A. 亚历山大和B. A. 博戈罗季茨基说:“追求自由和独立,厌恶教条主义和墨守成规是博杜恩·德·库尔德内教授在科研中的主要特点……这种智慧的自由和独立,使得博杜恩·德·库尔德内教授做出了一系列有独创性的、可靠的观察和发现。”(Колесов: 2003, 298)波里万诺夫甚至认为自己老师的语言学思想完全涵盖了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的内容。他说:“索绪尔的书被许多人视为一种创新。但将它与在很久之前博杜恩和博杜恩学派取得的成果作比较,在提出和解决普通语言学问题上,这本书不含有任何新东西。”(Поливанов: 1968, 185)维纳格拉陀夫在评价博杜恩·德·库尔德内时写道:“博杜恩·德·库尔德内的科研兴趣非常广泛,他的科学思想勇于创新、追求自由和独创性,他提出的许多概括富有前瞻性、重要性和现实性。这一切都令人惊奇。”(I, 18)

博杜恩·德·库尔德内的语言学思想也得到了其他欧美学者很高的评价。

约瑟·格林伯格写道：“也许，克鲁舍夫斯基和博杜恩·德·库尔德内的理论是所有理论中最深奥的。他们经常被看作是结构主义的先行者，因为他们将历史比较的成分融入到了自己的著作中。”（Алпатов：2007，8）

尽管博杜恩·德·库尔德内在科研中取得了惊人的成绩，尽管他的学术成就得到了众学者的认同，但博杜恩·德·库尔德内自己并不满意所取得的成果。他这样总结自己的学术活动：“初级的基础，不会集中注意力，热衷于社会活动，令人厌恶的不求甚解等等……我不记得，哪怕有一本书是从头到尾仔细研究过的。正是由于这一点，我一直有种不满足感。”（Колесов：2003，298）博杜恩·德·库尔德内的一生充满了坎坷，他不畏权势，是真正意义上的“真理捍卫者”。（Щерба：1974，383）他不断涉足新的研究领域，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语言学思想。他对一些语言学问题的观点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在逐渐发展与成熟。正如谢尔巴所说：“博杜恩·德·库尔德内的学术活动是不能简单地用一个公式就能表达清楚的。”（Виноградов：1963，11）

博杜恩·德·库尔德内为斯拉夫语言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被公认为是俄罗斯语言学界和波兰语言学界的学术泰斗。“博杜恩·德·库尔德内的名字不仅仅属于斯拉夫语言学，在我们看来，他对语言学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区域界线。在1870—1880年期间，博杜恩·德·库尔德内已经有欧洲名望的学者了。在这段时间里，他曾当选为巴黎语言学会的终生会员，芬兰—乌戈尔语系学会会员。新语法学派代表人物勃鲁格曼、雷思琴等高度评价了他的学术活动，他与索绪尔、保罗、梅耶、舒哈尔特等学者保持着通信往来。”（Амирова и др：2003，447）“他提出的一些思想和理论，后来成为各个语言学流派的主要思想。”（Звегинцев：1964，235）俄罗斯学者阿米洛娃等学者，更是强调了博杜恩·德·库尔德内在19—20世纪语言学中的意义。她说：“博杜恩·德·库尔德内在19—20世纪提出的一系列思想是能够被理解的，而且也得到了认可，但是这些思想只是在20世纪中期才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Амирова，Ольховиков，Рождественский：1975，480）

然而，我们也遗憾地看到，博杜恩·德·库尔德内虽然提出了在后来才得到进一步发展的语言学的重要理论，虽然他在早期的学术活动得到了新语法学派代表人物的认同，虽然他与当时许多欧洲知名学者保持着通信往来，但由于当时的语言学者都热衷于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博杜恩·德·库尔德内语言学思想与时代潮流格格不入，所以并没有产生应有的影响力。

有关博杜恩·德·库尔德内和结构语言学创始人索绪尔之间关系的种种推断,长期以来也一直是语言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问题。主要原因在于这两个伟大学者的语言学观点有众多相近之处,以至于有学者将博杜恩·德·库尔德内与索绪尔并列为结构语言学的创始人。布龙达尔曾说过:“我们不仅仅感谢索绪尔创立了新理论。还要感谢其他的学者,其中就有博杜恩·德·库尔德内。”(Звегинцев: 1965,97)马铁鸠斯在谈到博杜恩·德·库尔德内时也指出:“博杜恩没有见到的,索绪尔已经清晰地表达出来了……毫无疑问,索绪尔的两个重要的思想,即从共时角度分析语言、语言系统、语言结构,连同博杜恩·德·库尔德内在索绪尔之前提出的语言功能是构成新语言学的基点。”(Матезиус: 1965,145—146)

1923年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在俄罗斯出版,这部俄文版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在博杜恩·德·库尔德内的学生中间引起了强烈反响。他们发现了索绪尔与博杜恩·德·库尔德内在许多问题上的观点是相似的。谢尔巴写道:“他的学生在西方语言学的最新成果中并没有发现新内容。当我们在1923年,在列宁格勒收到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时,我们惊奇于索绪尔的许多观点与我们所熟悉的东西是相吻合的。博杜恩·德·库尔德内区分语言作为系统及语言作为活动即索绪尔的语言和言语……索绪尔提出的共时语言学是博杜恩·德·库尔德内整个科研活动的基础之一。索绪尔强调的符号性可以与语义化和形态化概念并列。”(Щерба: 1957,94)

列昂基耶夫在1960年纪念博杜恩·德·库尔德内时提到,博杜恩·德·库尔德内的观点在一定范围内超过了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就在同一年,雅可布森撰文说明索绪尔接受和使用博杜恩·德·库尔德内和克鲁舍夫斯基的语言理论。(Шардзенидзе: 1980,17)

1963年,维纳格拉多夫指出:“博杜恩·德·库尔德内的许多思想,在现代结构语言学不同的流派和理论中得到了应用和进一步发展,甚至歪曲。目前已经开始发展和强化一种观点,认为索绪尔是熟悉博杜恩·德·库尔德内的论著内容的,索绪尔在阐释《普通语言学教程》时,并没有摆脱博杜恩·德·库尔德内理论的影响。”(I, 12)我国学者李葆嘉在《语言学大师之谜和心理索绪尔》一文中写道:“索绪尔的主要理论原则不是他的独创或首创,在他还是学生之前,博杜恩与克鲁舍夫斯基已经写成论文和专著发表了。在相互认识以后,博杜恩并且寄给了他一些。”(李葆嘉: 2005,67)

虽然,学者们在博杜恩·德·库尔德内语言学理论对索绪尔的影响问题上,意见并不一致,尽管谢尔巴等学者的观点过于绝对化,但是我们可以肯定这种影响是存在的。因为关于博杜恩·德·库尔德内与索绪尔是否相识的问题,已经不是什么悬念,而是可以从多方面得到证实的。

首先,两位学者之间的书信来往,就是一个很有力的证明。在其中一封信中,索绪尔专门提到了1881年他与博杜恩·德·库尔德内在巴黎的相识。(Слюсарева: 1990, 242)雅可布森在《克鲁舍夫斯基在语言科学发展中的意义》一文中提到了博杜恩·德·库尔德内在1881年去巴黎参加巴黎语言学会,两次向学会提交了自己和克鲁舍夫斯基的论著的情形。就在这次会议上博杜恩·德·库尔德内当选为学会会员,作了《斯拉夫语言的语音问题》的报告,而索绪尔则在大会上宣读了论文《瑞士罗曼土语的语音》。(Якобсон: 1985, 345)

除此之外,在日内瓦大学的图书馆内还珍藏着若干部博杜恩·德·库尔德内和克鲁舍夫斯基的论著,其中一些就是寄给索绪尔本人的。(Шарадзенидзе: 1980, 18)

其次,1908年索绪尔在一个手稿中曾高度评价博杜恩·德·库尔德内和克鲁舍夫斯基的学术成就。他写道:“在没有超出纯语言学见解的前提下,博杜恩·德·库尔德内和克鲁舍夫斯基是最接近语言理论研究的人。但是这两位学者对于大部分西方语言学者来说是陌生的。”(Якобсон: 1985, 346)

尽管在索绪尔的思想和博杜恩·德·库尔德内的语言观之间有众多可圈可点的相似之处,比如语言和言语之分、语言的符号性和系统性、语言的静态和动态之分(索绪尔的共时和历时语言学)、类比性联想和邻接性联想(索绪尔的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语言的外部历史和内部历史(索绪尔的外部语言学和内部语言学),但我们也看到了这两位学者语言学思想的不同点。

虽然雅可布森等多位学者没有注意到这些不同点,但事实上是存在的。比如博杜恩·德·库尔德内对语言静态和动态的理解与索绪尔是有分歧的。博杜恩·德·库尔德内在《1877—1878学年度讲义的详细计划》中写道:“静态研究语言的平衡规律,动态研究语言在时间上的运动规律,研究语言的历史发展规律。”(I, 110)语言静态和动态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语言中没有静止的现象”(I, 349)。语言中的一切都在运动 and 变化着,静态只是动态的个别现象。而索绪尔则明确提出,共时态和历时态是语言发展的两个方面。“共时态和历时态分别指语言的状态和演化阶段。”(索绪尔: 1996, 119)他重视语言的现状,

反对语言学家跟着演化转。(索绪尔：1996,120)

索绪尔最初将语言学分为静态语言学和演化语言学，后来采用了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的术语。斯柳萨列娃认为，不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索绪尔之所以启用了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的新术语，是因为想避免博杜恩·德·库尔德内已经使用的静态和动态。“显而易见，索绪尔在课堂上使用的静态和动态术语是博杜恩·德·库尔德内使用过的，但是却没有将这两个术语列入到审订本中。”(Слюсарева：2004,87)

证明独创性、创新性的语言学思想是索绪尔一贯所追求的，所以“当他了解到博杜恩·德·库尔德内新的语言理论时，也许在赞赏之余不免顾影自怜。证明独创性的热望，燃起了他寻找更新突破口的熊熊大火”。(李葆嘉：2005,71)

不难看出，博杜恩·德·库尔德内的动态和静态之说与索绪尔的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之分的区别所在。虽然两位学者都强调从两个方面研究语言现象，都强调不能将研究的目光停留在历史上，然而，他们在一些关键点上出现了严重分歧。

博杜恩·德·库尔德内从辩证的角度阐述了静态和动态之间的关系，并不认为对语言的静态研究比对语言的动态研究更为重要。语言的静止状态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一切都在运动中。静态和动态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同促进语言的不断发展。而索绪尔对共时和历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如下的阐述：“语言学家要了解这种状态，必须把产生这种状态的一切置之度外，不管历时态。他要排除过去，才能深入到说话者的意识中去。历史的干预只能使他的判断发生错误。”(索绪尔：120)“这两种观点的对立是绝对的，不容许妥协的。”(索绪尔：1996,122)

两位伟大学者的观点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博杜恩·德·库尔德内承认静态和动态之间的区别，但并不否认二者之间辩证关系的存在，并不把共时态和历时态机械地对立起来；而索绪尔却将共时态和历时态视为完全对立、完全不相容的两个方面。

博杜恩·德·库尔德内关于语言的外部历史和内部历史之分，颇似索绪尔的外部语言学、内部语言学。按照两位学者的观点，内部历史或者内部语言学研究语言本身、语言系统。外部历史或者外部语言学强调语言和语言的载体的命运，包括历史、地理、民族、社会阶层、文化等因素。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索绪尔所说的内部语言学是独立存在的语言结构，完全与语言的载体没有关系。

他说：“语言学的唯一的、真正的对象是就语言和为语言而研究的语言。”（索绪尔：1996，323）

索绪尔在对待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之间的关系上态度是模糊的。他一方面认为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作为语言学的两个方面是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的。他说：“一种语言的自然的、有机的发展，我们能把它跟那语言由于外部的，因而是无机的因素而形成的人为的形式，比如文学语言，区别开来吗？”（索绪尔：1996，45）“研究外部语言学问题实际上回到了与内部语言问题不可瓦解的联盟中。”（Слюсарева：2004，97）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外部语言现象的研究是富有成果的，但是不能说没有这些现象就不能认识语言的内部结构……无论如何，将这两种观点分开是必不可少的。”（索绪尔：1996，45—46）

博杜恩·德·库尔德内的内部历史，强调语言是不能脱离语言的载体而存在的。“内部历史研究语言本身的发展，语言的生活，当然，不能采取非自然的方式将语言与其载体隔离开来。相反，总是与一个民族的物理和心理组织联系在一起。”（I，69）在他看来，历史比较语言学时期的“谱系树理论”和“波浪理论”的产生，就是缘于施莱赫尔等学者将语言看作是脱离人而独立存在的有机体的产物。（II，342—343）

博杜恩·德·库尔德内虽然看到了语言的内部历史和外部历史的相互影响，但他实际上是将语言的外部历史和内部历史分开论述的，认为内部历史与语言的命运无关。“内部历史研究的是一个民族在一定时间内或者数个世纪内如何说，为什么这样说，外部历史则是关心有多少人在说和在什么时候说。”（I，69）因此，内部历史和外部历史之间的关系，在博杜恩·德·库尔德内眼中，事实上是质范畴与量范畴之间的关系。

至于博杜恩·德·库尔德内的语言学思想对布拉格学派的影响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琼斯指出：“20年代后期，一批东欧学者推进了音位学的研究，由马铁鸠斯发起，他们组成布拉格语言学会。这些学者除了马铁鸠斯，主要的还有特鲁别茨可伊、雅可布森和卡尔采夫斯基。他们不是库尔德内的学生，甚至不是他的学生的学生，不过他们很熟悉他的著作。”（琼斯：1980，30）布拉格学派强调语言的功能性，“必须区分作为客观物理事实即表达的语音，和作为功能系统的成分”（徐志民：2006，180）的论点，在博杜恩·德·库尔德内关于音素和音位理论阐述中已清晰可见。

博杜恩·德·库尔德内是第一个明确提出区分两个不同的语音学学科，即

生理语音学和心理语音学的学者。在这个基础上，布拉格学派的代表人物特鲁别茨可伊进一步确定了语音学和音位学之间的区别，并确定了两类学科的任务。博杜恩·德·库尔德内提出的语言的静态和动态思想，在布拉格学派中得到了进一步延续和发展。布拉格学派强调语言共时分析的优先性，但是又不能将共时分析和历时分析绝对对立起来，真实地反映了博杜恩·德·库尔德内关于语言静态和动态的观点。在布拉格学派看来，“认识语言的本质和特性的最好方法是对现代语言作共时的分析。现代语言提供了详尽的资料，是使人们有可能形成关于它们的直接概念的唯一素材”。（Кондрашов：1979，148）

虽然布拉格学派提出了“语言联盟”的理论，但其根源可以追溯到博杜恩·德·库尔德内关于所有的语言都是混合的结果的阐述。

特鲁别茨可伊的《音位学基础》的理论依据，首先是博杜恩·德·库尔德内的心理音位理论，即“语音表象”。

正是因为受益于博杜恩·德·库尔德内的这些思想的影响，布拉格学派在一些问题上的看法区别于其他结构主义学派，独具特色。

随着布拉格学派语言学思想的逐渐成熟，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开始发现心理学的表达方法，只能导致音素和音位界限的模糊不清，指出在确定音位时，必须排除“语言意识”，即博杜恩·德·库尔德内的“语言感觉”的影响。因为音位首先是语言学概念，而不是心理学概念。在评价博杜恩·德·库尔德内等学者的音位学著作时，特鲁别茨可伊指出：“我越来越远离博杜恩的体系……我总是觉得，如果绕开博杜恩和谢尔巴提出的定义……如果只吸取他们体系中的重要部分，那么显而易见，在不替换这些体系的前提下，我们今天所持的观点（雅可布森和我的）仍然是这些体系的发展。”（Трубецкой：1960，330）

后来，布拉格学派在解释音位概念和音位变体时，彻底放弃了博杜恩·德·库尔德内的心理主义语言观，认为最终只有从功能角度给音位下定义，才能摆脱音素和音位界限含混不清的状况。布拉格学派创始人、杰出的语言学者马铁鸠斯，曾经在《我们在语言学中走向了何方》一文中写道：“在博杜恩富有思想的语言学著作中，功能的概念起着重要作用。博杜恩强调音素在该语言中的作用，指出这个作用不等同于其生理特征。从而创立了音位概念。但是他不能从新颖的语言学理论中，为语言学方法和语言学系统做出结论，因为他误解了心理学，过于关注语言变化的事实。”（Матезиус：1965，145）

布拉格学派虽然自认为是索绪尔遗产的继承人，并努力将其理论付诸应

用,但是他们在一些问题上的看法却与博杜恩·德·库尔德内如此接近。比如,布拉格学派强调共时和历时语言学之间的联系,历时变化也构成系统的观点,完全是博杜恩·德·库尔德内的语言静态和动态观的翻版。“语言联盟”理论精华也正是博杜恩·德·库尔德内的语言混合理论的完美发挥。

虽然布拉格学派最终摒弃了博杜恩·德·库尔德内的心理主义语言观,虽然他们在继承索绪尔结构语言学思想的同时,也在强调与索绪尔思想的对立,但是他们并不否认功能和结构语言学是源自于博杜恩·德·库尔德内和索绪尔。马铁鸠斯指出:“建立在博杜恩·德·库尔德内和索绪尔思想基础上的功能和结构观,如今对于未来语言学者来说,已经成为能够提供丰富基础的唯一理论。”而“索绪尔的两个主要思想即从共时角度分析语言和语言系统观,与博杜恩·德·库尔德内在索绪尔之前提出的‘语言功能’,毫无疑问成为了创建新语言学的主要基础”。(Матезиус: 1965,146)

博杜恩·德·库尔德内和索绪尔这两位伟大学者思想的影响在布拉格学派论纲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成为布拉格学派对抗新语法学派理论和实践的重要依据。马铁鸠斯写道:“历史的研究被认为是语言学工作的唯一方法;即使研究活的方言,其研究的成果首先是用于解决历史问题。虽然有时强调语言是符号系统,但由于研究的只是孤立的事实,所以成为妨碍了对语言系统性的认识……个别语言现象的孤立也阻碍了语言功能所具有的作用。”(Матезиус: 1965,143)

总之,无数的事实可以证明,博杜恩·德·库尔德内一生不仅为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且在普通语言学方面也提出了具有前瞻性的语言学思想,深深地影响到未来语言学的发展走向。

博杜恩·德·库尔德内被学者们称为结构语言学奠基人之一,他对现代语言学的影响表现在他的一些理论观点直接被后来的语言学流派吸收和发展。无怪乎有学者在评价博杜恩·德·库尔德内时写道:“如果克鲁舍夫斯基不是英年早逝,如果博杜恩的学生谢尔巴们将老师的遗著编成全面阐释现代语言学的专著,那么现代语言学鼻祖的桂冠也许不会落在索绪尔的头上。”(李葆嘉: 2005,75)

需要指出,博杜恩·德·库尔德内的语言学思想中,虽然不乏结构语言学的观点,但他的整个语言学思想及其架构远比结构语言学丰富得多。他早在1901年撰写的《语言学或者19世纪语言学》一文中就总结了19世纪语言学的发展状况,并对百年后语言学的发展趋势做出了大胆的预测,提出了20世纪语